

匈牙利剧变的前前后后

周东耀 刘为民

238

新 华 出 版 社

匈牙利剧变的前前后后

周东耀 刘为民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匈牙利剧变的前前后后

周东耀 刘为民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 603 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15,000 字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894—9/D·348

定价：2.80 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制度更迭”，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共产党失去了政权，政治上建立了“多党议会制”，经济上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过渡。

匈牙利等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它的内外原因、国际背景究竟是什么？共产党人和国际共运应从这一剧变中汲取什么教训？它的前景如何？

作为新华社的驻匈记者，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广泛地采访了匈牙利的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主要领导人，如社工党前总书记、一段时期兼任政府总理的格罗斯、社工党前主席、改建后的社会党主席、匈六十年代“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社工党前中央书记、现任国会副主席的絮勒什、社工党前政治局委员、改革初期的政府总理福克。我们也采访了社工党现主席、近两年两次访华的蒂尔迈尔，社会党主席团执行主席维塔尼等，他们都是这一事变的经历者和目睹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其他人更有亲身体会。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现政权中的一些核心人物，如匈政府

中经济内阁负责人、财政部长库保，外交部长耶森斯基，国际经济关系部长卡达尔以及一些社会名流，他们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对当前匈牙利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及对中匈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

此外，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遵循“冷静观察”的方针，目睹了匈牙利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客观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实，用综述等形式反映出来，供研究人员和读者参考。

周东耀 刘为民

1992年7月

目 录

1. 与匈社工党前总书记格罗斯的谈话	1
2. 与匈社工党前主席、“经济改革之父” 涅尔什的谈话	27
3. 与匈社工党政治局委员、政府前总理 福克的谈话	33
4. 与匈社工党主席蒂尔迈尔的谈话	40
5. 与匈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维塔尼的 谈话	54
6. 一位老共产党员谈匈演变的原因和 教训	62
7. 与罗兰大学政治系主任比豪里的谈话	69
8. 与匈财政研究股份公司总经理伦杰尔 的谈话	75
9. 与匈国会副主席絮勒什的谈话	79
10. 与匈财政部长库保的谈话	88
11. 与匈牙利外长耶森斯基谈他访华的目 的和两国关系	95

12. 参加匈牙利社工党记者招待会印象记	99
13. 从 8.20 活动看匈牙利的几点变化	104
14. 匈牙利前党中央大厦被国会六党瓜分	109
15. 匈牙利竭力抹去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 中的形象	112
16. 拜谒卡达尔墓	116
17. 匈牙利人民群众对右翼政府不满情绪 的一次总爆发	120
18. 从一些数字看匈牙利当前的经济概况	124
19. 1990 年匈牙利外交政策的重点由东方 转向西方	129
20. 匈牙利物价大幅度上涨 居民生活将 更加困难	135
21. 匈牙利治安状况严重恶化	138
22. 华约, 在布达佩斯被“埋葬”	141
23. 匈牙利国内在偿还外债问题上出现两 种不同观点的争论	143
24. 匈牙利国会通过《补偿法》将带来严重 社会和经济后果	148
25. 匈牙利为前红衣主教明曾蒂举行大规 模迁葬	153
26. 匈牙利人民怀念卡达尔	156
27. 私有化总体设想与基本原则	158
28. 东斯朗姆灯泡厂私有化一例	162

29. 匈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发展速度令人
瞩目167
30. 惟有多瑙水，无语东流
——匈牙利社工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侧记169
31. 在如何消除 1956 年事件的后果问题
上匈牙利国内存在不同看法172
32. 1991 年匈牙利经济私有化的特点、困
难和前景174
33. 匈牙利搞市场经济在东欧国家中进展
最快182

与匈社工党前总书记 格罗斯的谈话

(1991年10月17日)

我们早想采访一次匈牙利社工党前总书记、匈牙利政府前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同他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八十年代后半期，格罗斯在匈牙利历史上曾起过举足轻重作用，但在1989年他任社工党总书记期间，社工党被改建为社会党，党发生分裂，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不仅他本人失去总书记职务，执政四十余年的共产党也丧失了政权。匈牙利建立了以原共产党人反对派组成的政权。对这样一个历史转变事件的经历者和目击者，格罗斯一定有许多想法、看法。甚至他本人目前如何工作、生活，我们都是感兴趣的。

机会终于有了。今年10月12日，我们去匈牙利北部城市绍尔戈陶尔杨采访匈社工党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听说格罗斯也以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休息期间，我们找到了他，除了听取他对这次会议评价外，直截了当地提出想采访他，坦率、豪爽的格罗斯一口答应下来，说时间地点派秘书同我们联系。

10月17日下午两点，我们沿着3号高速公路驱车准时

来到布达佩斯东北部三十公里处的农业大学城格德勒附近，按照事先约定，一辆深蓝色的法国标致牌小汽车等在路边，开车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匈牙利妇女，我们没有下车，她就带我们穿过格德勒城向东南又行了五公里。这里，树木繁茂，风景幽美，居民不多。在一幢新建的深棕色别墅式房子前停了下来，车未停稳，格罗斯就过来替我们打开院子大门，热情地欢迎我们进去。

站在我们前面的这位前总书记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白格毛衣，没系领带，象许多我们匈牙利老朋友那样随便、好客。他1930年8月出生在匈牙利东北部工业重镇米什科尔茨一个工人家庭，年青时当过印刷工人，后进党校学习，在党的机关和报纸编辑部工作。六十年代中期，他来布达佩斯任匈牙利电台、电视台的党委书记，此后任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部长，地方上的两个州委第一书记。1984年，他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1987—88年任匈牙利政府总理，1988—89年接替卡达尔任匈社工党总书记。

格罗斯的家似乎象一个小公园。他说，这个院子面积约为2500平米，1986年购买时每3.6平米（匈的一种面积单位）50福林（当时约合1美元），现在已涨到100福林，1987年开始建房，全靠自己力量，共花去350万福林，现在值一千万福林。除住房外，我们还看见几个工人还在修建。格罗斯说，这一个是车库，另一个作仓库用，还有一个暖房。这里附近分布着大小九个湖，他用年租金2300福林租下其中一个，湖旁放着两套钓具，这是请客人钓鱼用的。

我们走进住房，这是一幢设计颇具特色的两层小楼。从外表看，很象一个木结构大蒙古包，里面是九边形，底层除厨房、盥洗室外，中间是一个有近 50 平米的大客厅、工作间和餐厅，二层面积小些，是卧室。客厅墙壁上挂着十多对格罗斯用自己猎物制作的装饰品——巨大鹿角、毛皮、野猪牙、猎枪以及油画等。大理石砌成的地上铺着地毯，有一台 29 吋彩电、录相机、组合音响。从住房、汽车和布置来看，格罗斯过的是相当于匈牙利中上略偏富裕阶层生活，但他好的也不在少数。

格罗斯目前退休金为 21000 福林(相当于 280 美元)，妻子两年前病故，目前单身住在这里，女秘书照料他的工作、生活。他的两个儿子均已成人，大儿子是电气工程师，二儿子在一家责任有限公司工作，有四个孙女儿。已逾 61 岁的格罗斯看起来要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动作利索，思维敏捷，讲话滔滔不绝，看不出有什么憔悴或心灰意懒的样子。他请我们喝咖啡，自己喝红葡萄酒，坐在沙发上不断用左手比划着同我们谈话。秋日夕阳的余晖通过窗户洒满全屋，我们从匈牙利政局剧变特点、社工党丧失政权教训、56 年事件、对卡达尔评价一直谈到当前匈牙利、东欧、苏联政治形势。看得出，格罗斯对我们并不刻意忌讳什么，洋洋洒洒，在中国记者面前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错误，对一些棘手问题，他也从容对答。

谈话开始后不久，有人按铃，进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匈《人民自由报》前副编辑霍瓦涅茨·拉斯洛，他曾于 1987 年应《人民日报》邀请访华，他请格罗斯看他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看得出，他们关系很亲密。

谈话进行到下午四点多，格罗斯建议我们休息一会。使我们惊讶的是，女秘书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一盘炸鸡腿，一盘炸肉丸子，两样泡菜：腌黄瓜和柿子椒，一盘面包。女秘书因有事回去，他就自己从厨房里拿饮料给我们斟上。格罗斯胃口颇好，他一边不断请我们吃，自己也吃了二个鸡腿，几个丸子，二片面包，喝着葡萄酒，不断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说，他业余嗜好是打猎、钓鱼，80年代前几乎年年冬天都去打猎。

直到夜幕浓重地笼罩住大地，我们的谈话才告结束。当我们开始照相时，他很亲切地分别同我们合影。因为朋友霍瓦涅茨坚持要我们上他家去，我们同格罗斯告辞。门一开，他养的两只大白狗及一只小种狗争先恐后地扑过来同他玩耍。他说，他不乏朋友，经常有人来找他，也包括外国人。他也要我们不拘礼节，尽可作为朋友来访。我们驱车开出院子时，格罗斯帮着我们开关大门。当我们的车子在深秋一片雾气中离开时，我又回头望了望格罗斯，只见他还在门口向我们挥手。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前总书记、匈牙利政府前总理格罗斯·卡罗伊答新华社记者问共分六部分，内容如下：

时间：1991年10月17日下午；

地点：匈牙利格德勒市郊格罗斯家

第一部分

格罗斯谈匈牙利社会和政治制度改变的特点

问：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您认为匈牙利制度改变的特点是什么？

答：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正当的，也是很重要的。匈牙利自1956年以后政治民主的水平比其他东欧国家高，这是由于卡达尔的思想造成的。所以连我们的敌人和反对派都认为卡达尔是“温和专政”的代表，这并不是偶然的。确实，他的整个思想就是这样的。这与卡达尔坐了多年监狱也有关系，在这期间他学到并接受了許多东西，知道重新当政之后应注意什么，他经常说，党应当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党。同时卡达尔也不想干预社会其他阶层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卡达尔是非常人道的，这是他整个当政时期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匈牙利的反对派目前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没有反对原制度的基础。那时允许发表各种意见，很少采取行政措施，只是禁止了几种报刊的发行。这是匈牙利反对派感到头痛的问题。反对派的头面人物以前要么生活很好，要么担任过重要职务，有的还得到过政府的奖励。这是一种奇特的反对派。从他们的政治作风上也可以看出，这些反对派是从卡达尔的学校里出来的。这是匈牙利制度改变的一个特点，即能造成争论和对抗的问题很少。这同波兰的情况不一样，同捷的情况也不一样。捷对反对派的态度十分强硬，卡达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就灵活得多，给他们很大的行动自由。卡达尔想建立一种非常人道的社会主义。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知道反对派到底想干什么。

目前对前制度的诽谤和诬蔑不是以事实而是以情绪为基

础。因此，他们现在相互攻击以前谁担任过什么职务和成长的过程也并不是偶然的。现在的小农党主席托尔·詹曾 17 次提出加入社工党的申请，没有被接受那是另一码事。现在的布达佩斯市长戴姆斯基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警察曾对他采取过措施。那时反对派没有受到什么压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情况对后来整个制度改变的过程都产生了影响。反对派没有产生的土壤，除了进行诬蔑和诽谤之外，对原来的制度说不出什么。

制度改变的另一个特点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发生了分裂。党内的改革派，有人也称为改革的共产党人（我不同意这种提法）早就同反对派结成一伙。这些人以波日高伊（原社工党政治局委员、党的 4 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他最早在党内提出 1956 年事件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起义，最早提出应改变制度。作者注。）为首，主要也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在分裂党的问题上他们同反对派是一致的。实际上波日高伊等人也是上了反对派的当，反对派欺骗和耍弄了波日高伊。波日高伊直到最后一刻还相信他会进入新政权，以为自己的表现会得到回报。当时党没有能力同这些人进行斗争，这是有许多原因造成的。

党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可以作为专门一个问题来讨论。卡达尔时期的问题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在这些问题上从 70 年代末我同卡达尔就有分歧。我认为当时党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政治领域，这是由于卡达尔的哲学造成的。卡达尔不喜欢别人对他的政治战略发表意见。党逐渐成了一个只是

处理日常事务的党，结果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政治。80年代初我们一些人就提醒应注意这种情况。后来当政治斗争激化以后党员几乎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党也因此受到了惩罚。

在谈到匈牙利制度改变的特点时，无论如何必须提到党的领导层中出现的叛卖行径。这种叛卖欺骗了群众，也欺骗了广大党员。党员在政治上对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准备，对形势的变化只能目瞪口呆。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曾三次发表讲话，指出党将毁于改革俱乐部之手，改革俱乐部是1989年5月成立的。但当时有些党员很幼稚，不听我的忠告，把改革俱乐部的人选为14大代表，结果14大的700名代表中有540人是改革俱乐部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蒂尔迈尔（现社工党主席）的看法也不一样，他认为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党员没有任何责任。我认为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也负有责任，因为事先我们多次提出了警告。

第二部分

格罗斯谈社工党丧失政权和匈牙利制度改变的原因、教训

问：您认为社工党丧失政权的原因是什么，从中可以吸取些什么教训？

答：社工党丧失政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匈牙利根本的问题不在政治体制方面。在原来的政

权时期，民主化的程度要比现在高。当然政治体制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的崩溃。外债后来高达 190 亿美元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照应有的速度得到提高。这是客观原因。

从主观原因上说，卡达尔不愿按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消费水平的提高。他担心这样做会同构成政权基础的两个阶层发生对立。一个是劳动者阶层，大幅度提价必然涉及到这些人的生活。卡达尔不希望削弱政权的政治基础，结果采取了大量吸收外国贷款的办法，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决定。构成政权基础的还有领导者阶层。当时的看法是增加领导人特别是经济领导人的收入，想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后来经济领导人的收入尽管大量增加了，但社会劳动生产率却没有提高，因为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劳动生产力同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70 年代出现的世界能源危机又加重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形势下，既然生产上不去就应当压缩消费，但卡达尔不愿这样做，他认为能源危机会很快过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认为匈牙利最根本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当年宣布进行改革时，他首先想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苏联的经济却每况愈下。这两者的关系应当颠倒过来，先进行经济改革，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政治改革。

生产上不去，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的原

因是从 80 年代初起没有实行同个人物质利益挂钩的制度。集体物质利益制度在农业合作社中倒是实行了，但真正的个人物质利益制度在这里也没有实行。

生产效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个人所有制的成分，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国家所有制占 96%，个人所有制只占 4%，这不符合匈牙利的实际，当然 30—40 年后也可以这样做。把什么都实行国有化是错误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另一个教训是没有考虑全面发展的问題，忽视了科技进步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国家经济发展不快有客观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主观原因。对这些问题卡达尔也看到了，但形势发展到 1988、1989 年时，他表示自己已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当时卡达尔还指责许多人欺骗了他，特别是原国家银行副行长费凯泰和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豪沃什对他隐瞒了实际情况。实际上卡达尔对许多问题是清楚的，只是不愿承认。他担心触及经济体制中的问题会引起社会上强烈的政治反响。1985 年 13 大时卡达尔仍主张加快发展速度，豪沃什支持这种观点，原总理拉扎尔则持反对态度。1985 年作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定，结果一年后外债就增加了一倍。当时的经济政策违反了经济的发展规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想办法解决大企业的问题。没有勇气把 1968 年开始的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

问：有人认为，匈牙利党内对 1956 年事件的争论加速了政权的丧失，您认为这一争论在制度改变过程中产生了什么